

輯三第庫文代現

丁文江先生

瀨文翁等著

華夏圖書出版社印行

第庫文代現

丁文江先生

瀟文翁等著

華夏圖書出版社印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文庫第三輯

丁文江先生

定價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版權印有究必

著者翁灝等
編輯者張其
發行人徐公
發行所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公

上海九江路二一九號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印刷者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刷廠

上海丹陽路一四〇號

丁文江先生遺像



丁文江先生

原底本缺此頁

本冊收集丁在君先生紀念文字九篇（一）「丁文江先生傳」係翁詠霓先生所撰，有油印本，其所撰英文傳記載于中央地質調查所刊行丁文江先生調查報告。（英文本，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二）「追悼丁在君先生」一文，係翁先生為中國地理學會出版之地理學報而作，載於該刊第二卷第四期，二十四年十一月。（三）章鴻釗先生撰「我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一文，原載於地質論評，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四）葛利普先生撰「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一文，由高振西君譯為漢文，原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五）中國地質學會所編輯之地質論評，曾出丁文江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二十五年六月）謝家榮先生有編輯後記，茲特錄出而改題曰紀念丁在君先生。（六）黃汲清先生「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載於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七）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中央地質調查所刊行「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係丁先生自民國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在冀晉魯滇桂黔川各省實地考察結果，共七百六十四面，附插圖四十四，圖版四十五，黃汲清君有編輯後記，茲亦錄出另成一篇。（八）拙著「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國地理學之貢獻」一文，原載方志第九卷第二期，二十五年一月。（九）拙著「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原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茲已加以增訂。

張其昀敬識

三十七年雙十節

丁文江先生傳

翁文灝

丁文江先生字在君，一八八七年生於江蘇泰興縣之黃橋鎮。先生自幼聰慧，十三歲時參加攷試，即已名列前茅，所作試卷暢論漢武帝開拓西南之功業，此種對西南所發生之特殊興趣，似已預示未來工作之重心，蓋其最重要之地質工作，均係集中於滇黔及鄰近諸省也。

二十世紀初葉，我國青年因念未來責任之嚴重，每多渴望留學海外，藉求深造。先生於一九〇一年東渡，是時在日之一部份中國僑民方醞釀革命運動，先生對此種運動亦深感興味，惟因鑒於中國當時所急切需要者為從事文化與經濟發展之專門技術人才，故復多方設法，於一九〇四年前往英國。抵英之初即埋頭於語言及普通智識之訓練，越三年始進入葛萊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之地質系，受教於格里哥萊教授(Prof. J. W. Gregory)之門。在入學葛大之先，先生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曾旅行歐陸，對於法德語言亦得一學習之機會。

一九一一年先生畢業於葛萊斯哥大學，隨即啓程返國，船抵西貢，即舍船登陸，旅行於雲南貴州湖南諸省，並攷察其地理及地質情形，以為他日工作之張本。

一九一二年先生在上海南洋中學教授生物學，並於課餘之暇，編著一動物學教科書，內容甚為完善。一九一三年先生為北京政府之工商部邀任地質科長。當時地質科學在我國尚極幼稚，能作實際工作者更屬少數，先生有鑒於此，頗覺有訓練青年人才之必要，因即與章鴻釗先生共謀進行。一九一三年七月地質研究所（學校性質）成立，章任所長。而先生仍以大部份時間從事於野外工作，石家莊與

太原間之地質圖即於此時製成，此後對於山西省內之煤鐵與黃鐵礦，亦曾攷察多處。先生早期之地質工作得梭爾格博士（D. F. Soëger）之助力甚多。此君為一德籍之青年地質學家，曾在北京京師大學教授地質兩年有餘。一九一二年京師大學地質系停辦，所有設備全部借與工商部新設之地質研究所，先生原擬聘請梭爾格為該所之主要教師，但卒因彼於一九一四年在青島為日本當局所拘留而未果。是時余適自比利時返國，因即被邀在該所任教。

先生之主要工作係在雲南，彼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行抵昆明，旋即在素以產錫聞名之箇舊開始工作。當時該地每年所產之錫總值約一千至兩千萬元，其後亦復屢有增加。四月間先生返抵昆明，但不久又出發滇東及滇北，行經富民、武定、元謀、東川、巧家、曲靖等縣，此外亦曾進入貴州邊境，並跨越金沙江而抵四川之會理。此次旅行迄一九一四年冬始告結束，足跡所至，無不儘量測製地質圖，並特別注意各地之礦產情形，旁及當地礦業及冶煉工業發展史料之搜集，同時彼並乘此時機對於當地土人作成若干人類學上之測量。

先生著有關於礦產之論文數篇，以論東川銅礦者為主。彼於文中力言新舊採礦與冶煉方法之不同，並竭力提倡新法採煉。自十七世紀末葉以來，東川銅礦即為我國銅產之主要供給，關係至為重要，且自是以後，該礦始終受中央及省當局之統制。

一九一四年終，先生返抵北平，地質研究所中之古生物一課遂由先生擔任，蓋當時除先生外，尚無其他人選可當此任也。自是以後，彼所注意者為如何增加學生實地工作之時間與機會，原定課程復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為必修，並擴大其範圍。在每次旅行中，均詳細指示學生如何觀察，繪圖及

採集標本等等，且任何工作先生無不以身作則。師生足跡所至，遍及數省，一九一六年夏各生復經分別遣赴指定區域工作，並須將調查結果著成報告。該所學生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劉季辰君等，畢業後均加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該所是時方改組成立，隸屬於農商部，先生被任爲所長。

先生堅主地質調查與地質教育應分別辦理，於是部立之研究所遂停辦，而於國立北京大學內添設地質系焉。章鴻釗先生及余均加入地質調查所，分別擔任室主任，對於課務不復過問矣。

地質調查所之初期工作，著重於鑛產，其主要者爲煤鐵礦，間亦及於錫礦，對於早期之鐵礦調查，農商部瑞典顧問安特生 (J. C. Andersson) 及丁格蘭 (F. R. Tenggren) 等貢獻殊多。余當時亦曾將全國鑛產情形作一節要發表，廣大面積之製圖亦於是時開始，北京西山地質圖說附有十萬分之一地質圖一幅，可作此項工作之例證，該圖係葉良輔君等所著，然先生實助其成。此外復計劃測製一百萬分之一全國地質圖，並先行刊印第一幅北京濟南區圖。自一九一〇年起，地質調查所復開始發刊地質彙報與專報，迄今未嘗間斷。除地質論文以外，對於鑛業亦另立專刊，第一次中國鑛業紀要即係先生與余所編輯，對於民國以來之有關紀錄與統計，無不盡量羅列。

一九二〇年先生隨梁啓超先生赴歐，乃得乘機與各國科學家相晤見，返國時並路經美國一遊。彼因鑑於我國之古生物及地質工作尚須加緊進行，乃邀請原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之葛利普博士，(Dr. A. W. Grabs) 於一九二一年來華，任地質調查所技師，並兼北京大學教授。此外先生並推薦李四光君往北大任教。先生本人雖未與北大發生關係，然此古生物及岩石學等科之二大教授，皆係先生所羅致，其熱心於地質教育與事業於此可見。

此後古生物方面之貢獻與日俱增。且性質亦至關重要，先生乃創刊古生物誌，在一定標準之下，刊行各種有關論文，此一刊物不旋踵即已成爲世界上重要古生物文獻之一。

迄一九二一年止，地質調查所辦公室均集中於北平豐盛胡同三號，是年先生募款在兵馬司九號所建之圖書館落成，地質所之中心遂移至該處。當時地質所之預算極小，以之支付全部職員薪水尙每感不敷，故添建新屋及印刷刊物勢非借助捐款不可。

先生對於地質調查所之各項事務，固無不躬親處理，但野外工作仍未嘗厭倦。彼對魯南嶧縣煤田曾詳加研究，並代中興煤礦公司計劃測勘工作，其後中興公司已成爲我國最發達煤礦之一矣。先生亦嘗住皖南江浙各地調查，著有揚子江下游地質專報，由上海黃浦疏濬局出版。在此專報中，先生對於揚子江下游之各種變化，曾加以解釋，並於海岸綫之進展速率予以估計。

地質調查所於研究我國主要鐵礦之際，所員某君曾於冀北（現爲察哈爾之一部）宣化龍關兩地發現師狀赤鐵礦區，爲進行開發起見，乃有龍煙公司之組織，並在北平附近之石景山籌設化鐵爐，此一九二〇年事也。及龍煙公司組織成立，先生亦被聘爲董事之一，對於該處鐵礦及昌平延礦之研究，貢獻甚多。

一九二一年先生受任北票煤礦公司之總經理，從事開發熱河東部之煤礦，爲專心致力於公司事務起見，先生自請改爲地質所名譽所長，並呈請任命余爲代理所長，負責處理所務。先生去北票以後，對於該礦之發展悉心籌劃，經兩年之籌備，每日產量竟達兩千噸以上，揆諸當日之資本與規模，實不能不歎其辦理成效之大也。

先生對於徐霞客極為仰慕，徐為十七世紀之中國地理學者，遊歷極廣，其遊記至今流傳，我國之龍溪知揚子江真正源流，並對於雲南火山現象及廣西喀斯特地形，予以確切之解釋者，徐氏誠第一人也。先生曾將徐氏歷年坎窔之結果輯為專書，并為之傳，另附詳圖，載明徐氏所會述及之各種地理情形，於一九二三年脫稿。此後先生亦曾致力於軍事材料之搜集，著有中國軍事近紀一書。

為管理美國退還之庚子賠款，乃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設立，先生於一九二三年被推為董事，並為地質調查所取得經濟之補助。一九二五年先生被推加入英庚款之諮詢委員會。但該時先生對於國內之政治興趣正濃，彼因鑒於科學研究與經濟建設工作進行之不易，頗覺政治上非有澈底改革不可，先生乃與孫傳芳氏發生關係，是時孫氏方任五省聯軍總司令也。一九二五年先生被任為淞滬總辦，當時上海之會審公廨大權悉操外國領事之手，先生對於此項法權之收回，曾盡最大之努力，彼所表現之堅強意志與誠摯之談論，實足代表我國青年之新精神。此外市政方面衛生機構之創設，公用機構之改組，均出先生之計劃，實際上建設新上海市之整個基礎，已於此時大體奠定。當時北方之奉軍勢力強盛，屢欲取得蘇皖，先生則力勸其同僚在自己治內樹立近代行政。

一九二七年孫傳芳氏與國民革命軍作戰於江西，為革命軍所敗，乃北走天津，求援於奉軍將領，先生乃辭職而去，是時江蘇省長陳陶遺亦係採取同樣態度者也。

先生卸職以後，全家生活頗感困難，幸賴友人之資助，始克維持，經短期修養以後，先生復於一九二八前往廣西，遍遊各地，調查錫煤等礦。一九二九年先生與余合擬一西南各省之地質調查及製圖計劃，其大部份工作人員即由地質調查所派遣，先生本人亦自領一隊，由重慶入貴州省内工作，

其用費則係前鐵道部孫部長哲生所發給。另有一隊由趙亞曾君領導，自四川之敘州前往雲南，但不幸於滇北之開心場趙君遇匪被害，此事對先生為一莫大之打擊，蓋趙君實一最有希望之青年地質學家，且為先生所最賞識者也。先生受此打擊，其在貴州之調查工作仍復進行不輟，並南行至桂省邊境，詳細觀察其富于古生物標本之古生代地層。先生此次之調查工作，實為其畢生最精彩之一部，其原因蓋由於工作方法之成熟，與各地地層知識之增加，而最主要者仍因其本人當時已決定重致其全力於科學工作是也。是時助理其工作者為黃汲清王曰倫二君，黃君並單獨前進至貴州西部調查，至於測量工作則有曾世英君為助，若干地點之經緯度均係曾君所測定。先生從事野外工作約一年後，即返抵北平，對於所製地圖及剖面細加研究，並將其調查地質之結果與葛利普黃汲清尹贊勳俞建章計榮森諸君討論，其與古生物學理論上之聯繫，先生所領導之此項討論，對於其他科學工作者為一莫大之鼓勵，並使彼等感覺自身工作之富有趣味。先生當時曾立意將所有調查雲南貴州及廣西之地質與古生物材料重加整理修正，由地質調查所出版。

當此之時先生對於其他各種研究仍不斷進行，川廣鐵路計劃草成以後即開始中華民國新地圖之編纂。該圖後由申報館出版，以紀念其六十週年。先生并曾計劃編著一自先史時代敘起之中國通史，此種工作迄未完成，但其性質已可於陳衡哲氏中國論叢中所輯之先生論「中國文化之產生」一文內察其大概。在該文中先生謁力說明中國文化之真實演化與進步，適與一般舊派見解認為中國之成就多集中於古代者相對立。此外彼并企圖對於中國人種之體格作一比較研究，所獲材料除本人搜集者外，並羅致他人材料甚多，已據以作成若干比較表。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先生任教北京大學，擔任地質學通論之教授，在此課程中彼努力說明中國地質之特點，藉以解釋各種侵蝕沈積火山地震諸現象。先生并親自率領學生作野外旅行，所有地質問題均就地商討，當時任助教者如高振西趙金科二君，均深受其感動，決心繼續致力研究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月東北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內部亦疊受其威脅與騷亂，當時住居北平之一般愛國人士，目擊時艱，無不憂心如焚，感感對於時局真象有確切明瞭之必要，且一般輿論亦正需要公正之領導，於是胡適先生等乃創辦獨立評論週刊，先生為撰關於日本政治財政之論文多篇，均經陸續發表，此外該刊並登有先生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間之漫遊散記，內容述及第一次雲貴之遊，以及旅行太行山箇舊錫礦東川銅礦及觀察滇省及川南之土著所獲之印象，並對金沙江亦略加敍述。在此散記中先生力避談論地質，但其價值並不因此而減，蓋其對於各種地形礦業以及人種等方面透澈精闢之觀察，殊不可多得也。

一九三三年先生赴美參加在華盛頓及紐約舉行之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議，並提出論文兩篇，根據我國最近觀察之結果，討論石炭紀與二疊紀地層之分劃，以與他國典型剖面相比較。會議完畢以後，先生復前往歐洲，去英拜訪其母校葛萊斯哥大學，去瑞典訪晤其舊友安特生，并去蘇聯以大部時間研究地質構造與工業發展，先生并得蘇俄地質礦產測勘所之助，前往巴庫油田及其他富有科學及經濟實味之處所參觀。先生旅蘇遊記之一部曾在獨立評論發表，從其遊記中可知先生對於蘇聯方在進行中之偉大改造及建設事業，印象極深，并對於此類工作之卒能完成，深致讚美，蓋多數工作在開始初期均須有相當之犧牲，而其結果則莫不於全國永久之福利有所貢獻也。此外先生亦嘗為文刊諸天津大

公報，主張國家應力求統一，經濟建設應受政府統制，以及政府應有堅強政權，亦所不惜等等，其結論亦嘗明言徒有表面之經濟建設並不足恃，必須先有一堅強基礎，則具有近代智識及判斷力之人才實不可或缺者也。

先生返國以後即為中央研究院邀任總幹事，先生將北大課務結束後，於一九三四年夏就任新職，其在院中工作頗為該院長所信賴，并極得諸同人如傅斯年等之協助，自此以後先生乃移居南京。

中央研究院為先生最後服務之機關，到任伊始，即設法減縮一切普通開支，并將預算重行分配，以期適合各研究所之實際需要，彼并特別推進西南人種語言及沿海生物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亦因先生之力而迅速組成，其構成份子均為中國之著名科學家，每年開會一次。

先生任職中研院時，為尊重學術機關起見，竭力避免在其寫作中發表任何明顯之政見，個人亦完全停止有政治意見之行動，但對於中國科學工作之改進與協作，則無不竭盡最大之努力，同時彼并設法了解中研院各所工作之特徵與方法，以便更謀組織上之改進。化學研究所即在此時改組，由莊長恭君擔任所長。此外先生對於工業上之研究，亦絕未忽略，如倡導浙江省礦業之試驗是也。

同時先生對於西南土人之言語，亦頗致力研究，所著之彝文叢刻，即係收集土人之文字加以漢文釋義，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九三五年地質調查所遷至南京，中國地質學會新屋亦行落成，先生決定為中研院總辦事處建造新舍，俾對各所事務更易管理，且亦可將散置各所之圖書集中一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鐵道部委託先生查勘湘潭煤礦，以為寧漢鐵路供煤之用，同時教育部亦請

先生在長沙附近代清華大學覓一校址，先生應命前往，並開始研究衡山地質，不料在衡陽時竟中煤毒，當即由人護送至長沙湘雅醫院治療，然醫藥罔效，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溘然長逝，享年四十有九。

先生所任職務，除以上所舉者外，尚有中國地質學會會長，倫敦地質學會外國通訊員，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古生物誌總編輯，南開大學董事，及協和醫學院董事，同時先生亦為鋼鐵公司籌備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在去世之前并已完成若干工作。

此傳之作甚感材料不足，遺漏在所難免，因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也。本文之用意不過略示輪廓而已。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復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下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因此先生從不請教中醫，即在旅途中患病亦絕不破例也。先生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盲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重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奉行維謹，故身後遺產僅有數千元之存款，其夫人生活尚須依賴保險費之收入也。

先生之語言天才甚高，彼之富於興趣與熱心之態度，使中外人士均極願與其交往。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全部已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因此先生所搜集之地質材料大部份

均未發表，而此項材料多遠較其已發表之初步報告為佳，其所以遲不發表者，一部份之原因亦由古生物方面之研究未能竣事之故，在此情形之下，甚盼先生之友人能將其野外調查紀錄圖稿及剖面，細加研究並整理之。

先生一九一一年結婚，無子女，有一兄五弟，其遺囑係在死前一年所立，內中說明所遺之金錢產財均分贈其五弟，其妻之生活費則取給於保險費之收入，至於書藉則大部捐贈地質學會，彼并希望死後一切從簡，營葬地點應在逝世地點，佔地且不應超過半畝，凡此各點均經照辦，故先生之墓地即擇在長沙岳麓山之左家壠安葬焉。

追悼丁在君先生

翁文灝

在君先生的死是中國的大損失，『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人才如此難得，像在君先生的人中國能有幾箇？

在君先生是開始中國地質學工作之一人，他的功績特別是在實行野外調查，在這一方面講，他是中國地質學界惟一的人物。他在歐洲畢業後便從陸地經過雲南回來，進了農商部使專心做他的實地調查工作，做地質調查所所長的時候，每年總有很長的時間在外考察，在地質調查所及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不但以身作則實地旅行，而且堅決主張全體學生必須做一定實地工作。地質彙報第一號中，在君先生序文首列德人李希霍芬書中的話，他說『中國學者只知安坐室內不能吃苦登山，所以他種科學或能發達，惟有地質學中國人決不能做，』在君先生接下便說，現在我們已證明此話並不可靠了，中國地質學者登山涉水的工夫並不讓人。這種工夫的養成全出在君先生熱心提倡之力。

近年來在君先生做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他的工作第一在促進各研究所切實研究，把不能工作的人撤換了，把能工作的人請進來，而且與他們商定應解決的問題，應進行的步驟。第二在詳實規定各研究所的開支，各所的預算很真實的按照他們一年度應做工作之必需數目來規定，省下來的錢用以舉辦以前未做的工作，其結果是工作加多而開支減少。他並成立評議會，實際完成了全國科學院應有的組織。做這種事不但要熱心毅力，而且要有充份的專門科學的智識與經驗，在君先生死去之後，我想要找相當的繼任人一定是很不易的。